

书林漫步

新书纵览

闽都方志中的廉吏与廉政

□林光钊

闽都地区今存综合类方志61种,杂志、约100种(郑宝谦《福建省旧方志综录》),文献存量位居全国前列。这些方志不仅反映一方地情,同时也承载大量古代廉洁思想、理论和事迹,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其中的廉洁元素,可为研究古代地方廉洁生态提供一个重要的个案参考,也是传统文化价值现代转换实践路径之一。

群像窥视

廉吏是廉政根基,唯有吏廉,方能政廉。唐太宗特别强调自身廉洁的重要性:“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吴兢《贞观政要》)闽都方志人物传记记载众多廉吏,是古代廉吏群像的缩影。

其一,以不贪为宝。自战国子罕拒绝他人授玉以来,“以不贪为宝”成为古代廉吏的基本特征。戴珊,浮梁人,明成化年间任福建布政使,勤教养、通财赋,方志称其“自奉俭约,无他嗜好,退食惟焚香读书,终任不持闽中一物”(明万历《福州府志》)。于成龙,清康熙间任福建按察使,洁己奉公,一概不受下属赠送之物,清节为天下第一。不少闽籍官员外出为官,亦“毫发未取”。王公大,闽县人,任浙赣官时,“盐课例有赢金千余,公大却不取”(明万历《福州府志》)。这些官员恪守本心,不为财物所诱,两袖清风,宁静淡泊,充分体现古代廉吏洁身自好的高尚节操。

其二,享孔颜之乐。孔子、颜回皆不为环境所困,安贫乐道,不汲汲于富贵,此精神为闽都廉吏所继承。赵明,闽县人,明永乐初擢知上饶县,抵任后悉心民事,“正风俗,革吏弊,均赋役,息盗贼,治声茂著”(清乾隆《福州府志》引《明人物考》)。为政上饒期间,赵明布衣蔬食,日惟三餐,不享口腹之欲,后病逝于任中,下属清点其遗物,仅余白银一两。

陈瑛初为古田令,后擢为福建巡抚。他虽官至高位,但衣食起居等方面仍处于

寒酸状态,“草具蔬粥,日啖姜少许”,去世时也仅“一绋袍,覆以布衾而已”(清乾隆《福州府志》引《福建通志》)。许多闽都廉吏不贪图物质享受,更有甚者如陈朝铤“历官二十载,贫不异诸生。时乡居杜门读书,绝迹城市,死而子孙不能自存”(明万历《福州府志》)。闽都廉吏“奉如寒士,疏水粗糲”的物质生活,是古代廉吏重理轻欲、精神豁达的真实写照。

其三,养廉洁家风。闽都官员的廉洁行径,对其家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朱豹,上海人,明嘉靖间知福州,历官有廉声。时廉署有鸱鸢,豹幼子特别喜爱,欲将其据为己有,豹妻见状急忙制止,谆谆教导:“尔父未尝持一毫官物,二鸟亦官物也,可持归耶?”(清乾隆《福州府志》引《闽书》)不少闽都人士以“清白”传家,廉洁成为其后世子孙恪守的从政准则之一。陈宇,字伯爱,侯官人,五代时知湖州、房州等地,家无金银之器,其自诩道:“先世以清白遗子孙,岂惟富不可求,亦所不愿也。”(清乾隆《福州府志》引宋朱祐《琴川志》)在先辈廉洁为官的影响下,闽都出现不少廉吏家族,较著者如濂江林氏家族、闽县陈氏家族等,留下不少廉风佳话。

方志人物传记经历从无到有,再到细致分类的逐步扩展,记录地方治理向树立典范人物的推进过程。政府通过在方志中大量收录具有类似特征的廉吏传记,高度宣扬廉洁思想,表彰廉洁人物,使得方志成为传统廉洁文化不断传播的重要载体。

“六廉”兼备

我国廉政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周礼·天官冢宰》所述“六廉”,“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耻。”所谓“廉吏”,并非只是“清廉”,而是需要具备“六廉”于一身。

从历代志书所载内容来看,闽都廉吏自觉以修身齐家为己任。其一,勤恤民隐,

造福当地。身为一方父母官,闽都廉吏多怜贫恤苦,改善民生,具体表现在办学兴教、移风易俗、兴修水利、移风易俗等方面。唐珣,华亭人,明成化间以刑部郎中出知福州。唐珣为政以兴学劝农为本务,修葺学宫,增加书院,聘请老师教育本郡子弟;收聚土地,开垦农田,修筑水塘以抵御海潮。不仅如此,唐珣还倡修绿榕、广坑等桥,设置四乡义仓,禁止火葬,“其于便民之事,知无不为”(清乾隆《福州府志》)。

其二,严肃纲纪,不惧权贵。“公生明,廉生威”是一些官吏引以自戒的座右铭,也是闽都廉吏为政的基本准则之一。魏必昌,晋江人,北宋时任怀安尉、兴化录事。其为官清廉,无人敢以私事相求。刘克庄以诗赠之:“守法仁人勇,防身处女严。”(《送魏录事》)面对上级的无理要求,一些闽都廉吏不摧眉折腰,笃守本心。闽县人林士元,明正德年间知香山县,时有官员索贿,士元不从,斥声道:“朕民脂以奉上,吾死不为也。”(明正德《福州府志》)

其三,修己慎独,束身自好。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传统伦理形成向内探求的主体性道德精神,集中体现为以律己修身特征道德修养学说,即“修己慎独”。闽都廉吏亦将此视为从政之道根本之一,在实行具体廉政同时,还注意从道德层面自觉践履“廉德”。祁顺,东莞人,任福建右布政使。祁顺积劳成疾,临终之际朝廷赠赢金数千,其拒而不纳,更告诫家人勿受:“苟或人言,玷我名节,我死不瞑目矣。”(明正德《福州府志》)

一些廉吏还提出具体为官之道,客观构建古代“廉政”理论。潘府,明成化间得长乐知县,提出“居官之本有三:薄奉养,廉之本也;远声色,勤之本也;去谗私,明之本也”(清乾隆《福州府志》引《明史》)。潘府将“为官以廉”作为从政的明史和依循,可规劝后世官吏行迹,整肃贪腐不良风气。

中国传统对“廉洁”的设计包含个人节操、施政实践两大方面的规范,在此伦

理文化滋养下,廉吏们在保持高尚人格的同时,还积极治理国家或管理地方事务,但“六廉”之道高度抽象化,而方志载录廉吏事迹则将此具体化,并结合儒家政治理想,从文本层面构建当地廉洁文化。

公私同构

古代对“廉吏”的介绍主要围绕清、公、勤、慎四个方面展开,这构成传统中国官僚集团大力倡导的官德模式,渐渐成为评价官员德行的标准(胡兰《正史〈循吏列传〉立传标准探析》)。统治者在舆论上宣扬廉政之风,在实政中亦将清廉定为检核官吏政绩指标之一。国家权力的塑造力量逐渐介入,但凡有政治抱负的士人必定奉行廉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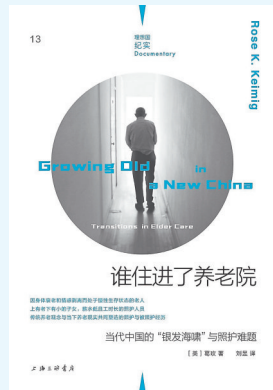
方志主为“资治、存史、教化”,受此学理性性质使然,其在纂修过程中会将那些具有“资治”“教化”史料纳入视野范围。南宋后,方志逐渐在人物志专设“名宦”“循吏”等载录当地廉吏,廉洁元素自水到渠成以传记、诗文、逸事等形式置入其中。同时,历代相承的志书致力于国家视野下的文化整合,这也使得方志“廉洁”文化不断得以修正与积累。

除了官方约定俗成的标准外,方志纂修者的个人选择也影响方志“廉洁”文化的塑造。从历代志书的纂修者来看,多具有传播廉洁道德理念的价值引领,如谢肇淛主纂明万历《永福县志》,卷二“官师”对历来永福知县、县丞等做一辑录,但内容多限于人名及籍贯,仅部分官吏载有事迹,而这些事迹多属“操守廉洁,理治勤敏”之事,显然是谢氏有意为之。这在一定程度反映出在儒家治理模式下,“廉洁”“廉政”成为士人最为看重的地方仕宦成就之一。

国家权力、个人选择贯穿整个方志“廉洁”文化的形塑,受此影响,大量载录“廉洁”文化元素成为方志纂修的应有之义。(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法学院)

《谁住进了养老院》

葛玫 著 刘昱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生育率的降低、预期寿命的提高和家庭结构的改变,让养老成为当下中国老年人和中年人必须应对的一大难题,一场“银发海啸”呼啸而来。这是一部针对中国养老机构民族志调查报告。作者将中国传统养老观念与照护理论相结合,从时间维度描述中国经历的养老形势变化,从空间维度展示不同形式的养老机构,分析当下养老困境,剖析老年人、家属及照护人员面对的衰老、死亡和照护难题。

《龙与狮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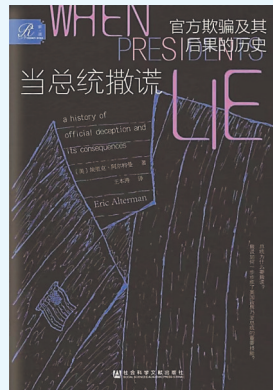
王宏志 著 东方出版中心



作为中英官方的第一次正式接触,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对两国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毋庸置疑,然而使团的沟通与翻译问题早有进入研究视野。本书聚焦翻译在这次中英对话中扮演的关键角色,通过对使团译员背景以及国书、敕谕、礼品清单、往来书信等各类文件的翻译和改写的考察,并基于对大量珍贵档案和多门语言文献材料抽丝剥茧式的深入挖掘和分析,力图还原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的翻译过程,向读者展示翻译在马戛尔尼访华事件乃至近代中国外交活动中的至关重要性。

《当总统撒谎》

埃里克·阿尔特曼 著 王本涛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到20世纪末,经历过民选官员众多谎言的美国人,大多数都已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撒谎是美国政府中普遍且公认的做法;令人信服的撒谎能力也已成为担任公职的必备素质。虽然大众已普遍接受政府的撒谎行为,但仍需要关注这种制度化的不诚实对美国政治文化产生的影响,而很少有作品对这一话题投入关注。本书基于大量原始资料详细研究了4位重要总统所说的谎言:富兰克林·罗斯福与雅尔塔协定、约翰·肯尼迪与古巴导弹危机、林登·约翰逊与第二次北部湾事件、罗纳德·里根与20世纪80年代中的美洲。展示了官方谎言如何反过来困扰说谎者本身及其继任者,又如何最终破坏他们最初通过说谎来支持的政策。

《生而为女》

海莉·鲁本霍德 著 小水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直以来,媒体热衷于告诉人们,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人都是妓女,且在这起连环杀人案件中,杀手成了被警方讲述的对象,而受害的女性不仅被媒体和大众忽略,更是被歪曲。通过搜罗大量的历史档案、庭审材料、证人证词,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作者破除“受害者有罪论”,将叙事还给女性,把历史写得跟小说一样好看,为读者还原了5名受害女性丰满而悲苦的一生。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绝非都是妓女,“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姐妹和爱人”,更重要的是,“她们是人”。她们之所以被杀害,并非因为不检点、道德有污,而是因为她们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她们最大的不幸,可能是生而为女。

读书观点

寻求流寓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契合点

□曾峥嵘

高峰论坛”,率先开始在冯梦龙文化中发掘廉洁基因,这也是全国范围内首次以廉洁文化视角深入研究和梳理冯梦龙的著作,第一次将廉洁文化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2017年,福建公布了“六大历史名人”的入选名单,冯梦龙赫然在列,位居第二,实现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向新时代廉洁文化品牌的成功蜕变。至此,冯梦龙文化作为福建省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成为福建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福建寿宁是冯梦龙为官所在地,苏州相城是冯梦龙的故乡。事实上,福建很早就意识到冯梦龙的苏籍身份,认识到苏州相城的天然优势。因此,早在1987年,福建就积极推动闽苏合作,并将第二次冯梦龙全国学术讨论会的举办地点定在了苏州。2014年,福建寿宁宣布与苏州相城结成友好区县,首次确立了在冯梦龙廉洁文化建设上的伙伴角色。

2018年,冯梦龙书院建设在苏州相城正式启动。2019年,冯梦龙书院顺利向公众开放。在闽苏两地的积极协调下,福

建寿宁“四知堂”在苏州相城重现,如期开馆。作为冯梦龙从政为官的场所,“四知堂”的成功迁移,标志着两地实现共享冯梦龙文化资源的初衷,也体现了两地共享冯梦龙廉洁文化建设成果的双赢。冯梦龙生于苏州,官于寿宁,但冯梦龙廉洁文化不能局限于某个区县、某个省份,只有两地甚至多地共同携手,才能使得冯梦龙廉洁文化的内涵不断深入,体系不断完善。

福建东靠大海,西隔山脉,与历史上的众多文化中心相距甚远,常成为官员贬谪流放之地。细究起来,离闽的闽籍历史文化名人,闽地往往少见相关记载,如柳永、李贽等;而寓闽的非闽籍历史文化名人,记载往往更为翔实,如河南的王审知、苏州的冯梦龙等。因而在面对冯梦龙文化时,兼容并蓄的八闽文化选择了化为己用,为冯梦龙文化打上了福建印记。

这启示我们,在发掘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时,对于非本地籍贯的历史文化名人不应直接采取忽略漠视的态度,而应该寻求流寓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契合点,努力发现

新的生长点,这样才更能展现本土文化的包容性与共时性,同时也扩大了选择和发展的空间。

冯梦龙的双重身份也正是其文化的特色之处:文人为官,官人为文,福建从其书《寿宁待志》中汲取廉洁力量,从其实录中领略廉洁魅力。福建寿宁与苏州相城之间的几次深度合作,无一不使得冯梦龙廉洁文化更进一步,无一不使得这一品牌文化在全国更具影响力。既共享文化资源,又共享建设成果,何乐而不为?地区发展并不是一个地区的家里事,而是全国各地的心里事,敢于合作,勇于探索,突破地区设限,向外寻求新解,与全新的地区文化相互融合,往往能带来更大的文化建设效益。合他地之力,能够为本地注入新的发展动力,有效解决了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

这启示我们,在推进廉洁文化建设时,一定要积极寻求合作,不能局限于自身的一亩方塘,不能不愿意把目光向外看,这样才更能展现廉洁文化的再生性与多元性,同时也提升了建设高度。

灯下漫笔

廖正一:让苏轼击节叹赏的闽籍诗人

□李宣华

闽北将乐县龙池团人,曾登宋天禧三年(1019年)王整榜第二名进士,这可是三明境内有史可查的第一名榜眼。

廖姓在将乐不算大姓,但确实是将乐的名门望族,人才众多。据将乐县志记载,晋至清代,将乐廖氏中有10人考中进士,66人任七品以上官员。其中,廖标于唐武德九年(626年)获丙戌榜第一名。将乐学者吴福瑞在《将乐文萃》一书写道:廖淳一家祖孙三代六人中,有五人登进士第,而且廖淳父子二人都“榜眼及第”,另有一人授进士职,在政坛和文坛皆有名声。

廖淳和大儿子廖子孟都考中了榜眼,孙子廖正一就是那个“在政坛和文坛皆有名声”之人。那么,苏轼以词作相赠的廖正一,是不是就是出生于将乐龙池团的廖正一?对此,清代徐观海修纂的《将乐县志》“卷之八·名达”一章给出了答案:“廖正一,

字明略。元丰二年进士。元祐中,召试馆职。苏轼得其策,击节叹赏。常居言路,著直声。出知常州,蔡肇称其‘汪洋之学造微,瑰玮之文绝众’,后谪信州玉山监务而卒。自号竹林居士,所著有《白云集》。”

在宋代元祐文坛上,廖正一确实名气不小,当年与廖正一同考中进士,后任户部、吏部员外郎兼编修国史的蔡肇对其“汪洋之学造微,瑰玮之文绝众”的评价就够高了,加之又有大文豪苏轼的“击节叹赏”,可惜的是,廖正一所著的《白云集》已经失传,不过《全宋诗》收其《瑶池宴令》一首:“花飞阵阵,春心困,寸寸别肠。多少愁闷,无人问,偷啼自温。残妆粉,抱瑶琴,寻出新韵。玉纤趁,南风未解幽温。低云鬓,眉峰敛翠,娇和恨。”

《全宋诗》也收入廖正一诗七首,其中一首《咏梅》写得非常清灵,相思之苦让人

读后动容:“惠兰芳草久睽离,偶占春光此一枝。自许轻盈输粉白,何人闲丽得邻窥。寒欺薄酒魂消夜,月下垂帘梦破时。幸有暗香襟袖暖,江南归信不应迟。”

廖正一于元丰二年登进士第,元祐初任华州司户参军,经同知枢密院事安焘推荐进入馆阁任职,并被召参加学士院考试。苏轼就是在此时发现廖正一的文采和天赋,对其“击节叹赏”的。从此,廖正一成了苏轼家的座上宾。有了这层关系,廖正一和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苏门四学士”学习切磋技艺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廖正一一生风清气正,为官敢于大胆直言,刚强正直。崇宁三年(1104年),蔡京为相,司马光、苏东坡等人被列为“奸党”。作为“苏门”重要成员,廖正一受到牵连,被贬为信州玉山监务,在悲愤郁郁寡欢中谢落人生之幕。

《将乐古代旅游诗词图选》书中“将乐风情”一辑,选载了苏轼的《行香子·赠廖正一》:“绮席才终,欢意犹浓。酒阑时,高兴无穷。共夸君赐,初拆臣封。看分香饼,黄金缕,密云龙。斗赢一水,功敌千钟。觉凉生,两腋清风。暂留红袖,少却纱笼。放笙歌散,庭馆静,略从容。”

从这首词来看,苏轼和廖正一的交情非同一般,喝酒尽兴后,又拿出上好的“密云龙”茶来款待,并十分用心地赋词相赠。那么,这个廖正一有着什么样的来头?清代徐观海修纂的《将乐县志》“卷之七·选举”一章有段记载:“子孟季子,登元丰二年(1079年)己未时彦榜。有传,见《名达志》。”说明廖正一是廖子孟的第三个儿子。

追本溯源,廖子孟是廖淳的长子。说到廖淳,很多将乐人都不陌生。他是北宋时期